

巴别塔下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The Verbal Anxiety of Victorian Men of Letters

乔修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巴别塔下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The Verbal Anxiety of Victorian Men of Letters

乔修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 乔修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697 - 2

I. ①巴… II. ①乔… III. ①英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42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得坦言，在我最初开始写这部理解论的时候，甚至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都丝毫未曾想到，这个研究居然还需要考虑词语问题。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

虽然无法最终战胜死亡，但细心照料也可以延长寿命。语言就像政府，会自然走向衰退。我们已经长久地捍卫了我们的政体，就让我们再为我们的语言做点努力吧。

——塞缪尔·约翰逊《英语词典序》

任何评论，只要它所用的术语和论据有哪怕丁点的含混，它就毫无意义。鉴赏家和评论家们所用的平常语言，即便他们自己懂得，外人通常也会觉得晦涩难懂，因为按他们使用专门术语的习惯，必然是什么都想说，却又什么都没说。

——约翰·罗斯金《现代画家》

序

陆建德

《巴别塔下》结构独特，是一部充满新意的著作。全书共七章，各章分别以卡莱尔、乔治·艾略特、狄更斯、罗斯金和穆勒的著作为背景，讨论“文人”“社会”“责任”“贫穷”“财富”“绅士”“自由”七个关键词。看得出来，修峰是受到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译本，三联书店 2005 年出版）的启发。上述几位作家深感很多词语用得多了，蜕变为没有意义的空话（即卡莱尔所说的“cant”），他们希望通过关于词语的讨论针砭时弊，重塑价值，给快速发展的社会一种方向感。在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中，19 世纪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而英国又是现代世界的发源地，^① 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对本国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商讨、辩论，对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本书“绪论”说，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和话语层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引起文人的焦虑。诚哉斯言，但是我想在此略作补充：“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往往也是创造力的象征。假如当时的英国社会缺少讨论问题的氛围和必要的公共空间，排斥异端思想和话语，

^① 详见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麦克法兰认为英国总是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也就是说，“众声喧哗”恰好是英国的特点。追求纯而又纯的“英国特性”（Englishness）大概是枉然的。

一些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说就不可能产生。且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伟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例。《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单行本）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行时没有署名，1850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登载《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杂志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宣言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宣言》的最后的文字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斗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1849年8月从欧洲大陆移居伦敦，在那里生活写作，直至1883年3月去世。没有伦敦以及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提供的优质服务，《资本论》的写作是无法想象的。^①如果英国实行的是早年马克思嘲笑的普鲁士式的报刊检查制度，马克思的著述生涯就不得不中断了。马克思绝大部分著作用德文写成，它们的英文翻译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我收藏的英文版《资本论》是1930年的人人丛书版，由牛津大学学者、社会主义者G. D. H. 科尔作序。人人丛书版图书售价便宜，影响大。那一年发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英国，但是英国政府部门对人人丛书版的《资本论》不加干涉，无意限制这本划时代巨著的阅读范围。今年大英图书馆为配合一次特展还出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售价1英镑。可见这份文献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想乘此机会添加一些与修峰这本书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而提出一两个问题，供读者思考。先说一说英国宪章运动。1838年5月8日，宪章派公布准备提交议会的法案“人民宪章”，包括六项内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卡莱尔早在1839年就写了题为《宪章主义》的长文，第一章的题目即“英国状况问题”。“英国状况”一时成了流行词。

^① 19世纪的伦敦是欧洲其他各国流亡者汇集之地，现任《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讨论过这一现象。参见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六章“革命的墓地”。

恩格斯于 1842 年秋冬之交从欧洲大陆到英国经商后，细致观察英国。他在这一年的 11 月 29 日为《莱茵报》写了短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第二天写了颇具规模的报道《国内危机》，谈的还是宪章运动中动荡的英国。这一年年底他为《莱茵报》写了文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时宪章运动正值高峰时期，在这次旷日持久的运动中，领导层内部出现道义派和暴力派的论争，游行请愿队伍一度配备了枪矛、棍棒等武器，政府方面甚至出动了军队，不过应对大致得当，没有出现失控的流血事件。^① 恩格斯看到英国工人有着难以克服的“守法观念”，不免失望，他提出批评，又表示乐观：

在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原来就是宪章派的——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他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只要四五个龙骑兵每人把住一个出口，就拦住了几千个集合在广场上的工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每个工人，当他一旦把自己的积蓄用光因而就要挨饿的时候，就又开始工作了。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②

由于种种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工人阶级的罢工、游行示威未曾中断，不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并没有到来。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1843 年出版后，恩格斯于 1844 年 1 月立即写了评论，在 1844 年的

① 详见 R. G. 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张自谋校，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50—551 页。

《德法年鉴》发表，他建议德国人把这部著作译成德文，紧接着这篇颇具规模的评论，恩格斯写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维多利亚时期的圣哲担心声音庞杂，其实声音庞杂也有其好处——社会毕竟需要在各种批评的声音中前进。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1845年问世，以后不断翻译成各种文字。要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必读之书。从1845年到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英国非但没有爆发欧洲大陆上常见的革命，反而通过零零碎碎的渐进式的立法、改革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非凡成就。尽管恩格斯对诸种英国式的尤其是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以为意，^①他还是为半个世纪里工人运动每一次小小的成功所吸引。

英国渐进式改革之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它之所以行得通，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首先，如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所示，英国工人坚信自己享有“生而自由”的权利，不断斗争，争取合法权益，通过种种令人同情、认可的形式向统治阶层施加压力。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1848）描写的就是曼彻斯特工人的艰苦生活，工人决定反抗，年轻的工厂主被暗杀，但是作者是把它作为不幸事件来呈现的。其次，在英国统治阶层中，也出现过像罗伯特·欧文那样善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总体上来说也知道妥协，有着适度“对正义和仁爱让步”（恩格斯语）的雅量。英国是一个讲究习惯、惯例（customs）的国家，大量民众维权行为总以和平方式收场，不会闹得不可收拾。^② 屈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曾强调，在18世纪的英国，阶级对立并不像法国那样严重，因而法国大革命不可能在英国发生。到了19世纪，阶级

① E. P. 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派到革命者》（1976）详细讨论了恩格斯对莫里斯（1834—1896）的批判，并对莫里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和艺术实践有所维护。

② 我在《习惯的力量——评汤普森〈共有的习惯〉》（载《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一文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矛盾加剧了，然而社会主流的声音绝不利于矛盾的激化。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盖斯凯尔夫人的《北与南》涉及劳资对立问题，但是主调却是阶级之间的理解、调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以议会改革法案通过的那一年1832年为背景，主人公霍尔特主张选举制度的积极改革，同时他又是秩序的维护者。1867年8月，第二个改革法案通过，这一年11月下旬，乔治·艾略特应约翰·布莱克伍德之邀以霍尔特的口吻写了《致工人》，在著名的《布莱克伍德杂志》1868年一月号发表。《激进派菲利克斯·霍尔特》后来再版的时候都将《致工人》作为附录收入。这篇长达三十页的文章声情并茂，自始至终论证和平手段的意义，很有说服力。乔治·艾略特珍爱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教育工人阶级也是她的“责任”。在19世纪的英国，议会通过了大量跟工人利益相关的法案。这些法案的有效执行，确保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至于因种种矛盾和冲突而停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是1892年下半年出版的，恩格斯在作于这一年7月21日的该版序言中写道：“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前结束的国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他们现在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为什么？因为在1892年的选举中有三位工人入选下议院。^①英国工人拒绝与两个旧的政党保持联系，恩格斯抑制不住他的欣喜：“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保持任何联系，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的是什么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 1892 年的选举中他们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的要求并且提出了要求。”^① 可惜恩格斯三年后就去世了。1900 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1906 年改称工党。随着工党的出现，恩格斯所说的两个旧党轮流执政的“跷跷板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了。

到了 20 世纪初期，宪章派当年提出的六项要求中的五项基本实现，政治权利的扩展其实远远超过了宪章派的想象，如妇女获得普选权，所有选民的参选年龄由 21 岁降到 18 岁。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技术上操作太难，没有被公众采纳。英国所走的逐步改进的道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非常值得研究，以往未予重视，是非常说不过去的。1884 年成立的费边社就是以渐进为原则，宣言由萧伯纳撰写。费边社标榜社会主义，积极参加英国工会组织各种争取权益的活动，会聚了一批文化界的精英。《英国工会运动史》（1894 年问世，1930 年商务印书馆出中译本）的作者就是费边社的核心人物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英国知识界一些人士（如比阿特丽斯·韦伯）出身富家，可贵的是他们完全背弃了家庭的利益，献身于争取社会正义的事业。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整个国家逐渐就如何确保全体成员的福利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于 1942 年 11 月公布《贝弗里奇报告》，这份里程碑式的调查报告奠定了英国战后福利社会的基础和具体的实行方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已于 2004 年出版了报告的中文本，收入“社会保障译丛”。^②

《巴别塔下》关于穆勒的一章专门谈及一个社会如何通过公共事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4 页。

② 福利社会会不会成为懒人的温床？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些不那么勤快的人。比如王梵志诗里有一首《世间慵懒人》：“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著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口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原无床，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未肯起。”英国现行福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审核申请人的资格，虽有不尊重人格之嫌，还是必要的。

务的“讨论”（discussion）来获取并传播真知。我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讨论还是非常充分的。让我也来引用穆勒这段话：“讨论，或质疑公认的观点，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是一回事。当所有观点都受到质疑时，就能最终发现哪些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古老的信条可以获得新的佐证；而那些一开始就不正确的信条，或因时过境迁而变得不合理的信条，也就被抛弃了。这就是讨论要做的事。正是通过讨论，才能发现并传播正确的观点。”只有“质疑公认的观点”，才能迎来开创性的学说和创新型社会。乔治·艾略特 1846 年翻译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质疑圣经上所说耶稣生平的真实性，过了不久，达尔文进化论（也可以译为演化论）从根本上动摇、颠覆了创世论。宗教的式微也使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诗人无所适从，而“信仰”一词渐渐被“责任”和“文化”所取代。本书数次提及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如有机会再版，建议修峰增添专论阿诺德“文化”观的一章。前面提到的威廉·莫里斯也值得一写，他的关键词是“艺术”。

英国社会没有压制挑战旧说的理论，这种开放、自信的胸怀令人敬佩。严复《天演论》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掀起一场文化上的地震，社会却因此获益。可以说，没有“物竞天择”的思想和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翻译界沟通中外的不懈劳作，救亡图存的意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就难以产生。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事业是与文化反思、文化自我更新结合在一起的。严复在 1906 年的一次题为《教授新法》的演讲中，鼓励听众发扬讨论、质疑的精神。他认为读书治学必须做到于不疑处有疑，新式学生必须敢于“荒经、蔑古”：“苟而同之，犹无益也。请言其不同之实。譬如今课经学而读《论语》至‘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其理诚然。顾其理之所以诚然，吾不能使小儿自求证也，则亦曰：‘孔子圣人，圣人云然，我辈当信。’无余说也。又治史学读《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如火如荼，然其境象，万不能使学者亲见之也，则曰：‘太史公古称良史，其书号为实录，

所载自宜不差。’亦无余说也。由此二者推之，我辈所读一切之书，所传一切事实，莫不如是。岳飞主战，乃是忠臣；秦桧主和，故为奸相。凡皆以枯骨朽肉之定论，主张我辈之信心……至若其事经皇帝所折中，昔贤所论断，则惟有俯首受教，不敢有违。违者或为荒经，或为蔑古。荒经、蔑古，皆大罪也。”^① 幸好批判性的创新思维自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迅猛生长，一百多年来已融入了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其生机勃勃的一部分。如果当时的读书人都是“俯首受教”的因循之徒，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进程和继往开来的全新知识结构。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一百二十周年，我在这篇序言的末尾还要向这个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文化机构致敬。好像是拉扯远了，其实不然。商务印书馆自创始之初就出版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作品以及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各种词典、刊物和著作，同时又不忘国本，大力普及传统经典。商务印书馆出书，意在引起讨论。陈云曾是该馆职员，他在为同人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指出：“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然，各方面的观察是不同的。我希望每个亲爱的商务职工，参加讨论，坚决地破除往昔中国人民普遍‘不谈政治’的现象。”^② 正如《巴别塔下》各章所示，维多利亚时期作家关于词语的讨论与今天的我们也密切相关，我们不妨展开对于这些讨论的讨论。

① 《〈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

② 《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926年记事。

目 录

序	(1)
绪论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	(1)
一 “词语焦虑”及其研究意义	(1)
二 “词语焦虑”的表现及原因	(4)
三 “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13)
四 “词语焦虑”的独特性	(18)
五 现象与个案	(25)
第一章 “文人”:卡莱尔的“英雄”	(32)
一 文人与英雄	(32)
二 “逻辑先生”与“文化偏至”	(39)
三 “方言”与“空话”	(43)
四 词语焦虑与“两种文化”	(48)
第二章 “社会”:卡莱尔的“理念”	(54)
一 重诠“社会”	(54)
二 伦理纽带	(59)
三 精神纽带	(65)

四 社会新生之路	(71)
第三章 “责任”:乔治·艾略特论社会维系	(74)
一 责任作为话语	(74)
二 《米德尔马契》:“旁观者”与“邻人”	(80)
三 《罗慕拉》:出走与责任	(87)
四 “责任”的伦理学	(101)
第四章 “贫穷”:狄更斯论词语暴政	(107)
一 艰难时世:道德神话与诗学正义	(107)
二 “饥饿的40年代”:吃喝与伦理	(117)
三 酗酒与道德压迫	(131)
第五章 “财富”: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	(139)
一 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	(139)
二 “财富”定义的社会史考察	(144)
三 “财富”的新定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53)
四 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维度	(157)
第六章 “绅士”:罗斯金论国民性陶铸	(162)
一 绅士理念与国民性	(162)
二 绅士教养与礼仪之邦	(172)
三 商人与绅士	(180)
四 商界绅士与“共同富裕”	(187)
第七章 “自由”:穆勒与知识无政府状态	(195)
一 自话与对话	(195)
二 含混与清晰	(207)

三	自由与边界	(214)
四	性格学与“两种自由”	(220)
结语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思想的回响:辜鸿铭的焦虑	(225)
一	另一种“西学”	(225)
二	卡莱尔与辜鸿铭	(231)
三	“维多利亚时代思想框架”下的“国学”	(236)
四	《中国人的精神》中的英国文人话语	(243)
五	辜鸿铭的词语焦虑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76)

绪 论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

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

——马修·阿诺德《文学与科学》

一 “词语焦虑”及其研究意义

“词语焦虑”这个说法恐怕还没有人用过。本书主要用它来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这是一种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这种“词语焦虑”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调整 and 道德重构的一种表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1832—1901）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时的文人在思考道德，也即在分析和讨论人应该怎样生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何种关系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理念、概念和词语上的分歧并不断就此进行论争，导致思想和话语层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令他们深感不安，使他们的写作带上一种明显的焦虑。

这种“词语焦虑”虽然本质上属于语言问题，却更突出地表现在词语层面，并且超越了语言，反映了文化与道德领域的焦虑。研究这种焦虑，不仅可以从中管窥符号体系的重塑过程，还能看到文化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并影响社会变化。

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焦虑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需要进行“精神分析”的病症。但本书所说的“词语焦虑”，却是

强调文人的自我意识或觉醒。他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无序不仅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或对话，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和社会思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破坏。

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尽管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仿佛身处巴别塔下，面对词语的混乱，因为难以沟通而焦虑不已，但仍有强烈的理性对话的愿望，努力探索能够共享的意义框架。因此，词语焦虑推动了意义体系的调整和重构，直接地影响了道德体系的重构。

文人的词语焦虑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既普遍又独特的“现象”。

说它普遍，因为它不仅在本书重点讨论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①还在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乃至与他们常常相左的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等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卡莱尔批判“空话”，狄更斯讽刺“词语暴政”，罗斯金揭露“假面词语”，穆勒剖析“僵尸信念”，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当然，与这些“圣哲”(sage)相对立或不甚一致的文人也有他们的焦虑，也有他们的救世之心。卡莱尔、狄更斯等人与功利主义者唇枪舌剑，但双方的差别和矛盾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水火不容，往往是激烈的言辞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共识。他们正是要寻找一种可以对话的意义框架。

说词语焦虑独特，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前所未有的，而是说在之前和

^① 这些作家大多拥有多重身份，或主编报刊，或担任公职，或在大学任教。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某种称谓，通常也就意味着要强调他们的某一方面。从作品形式或体裁上说，他们都属于“散文作家”(prose writers)。这里的“散文”是广义上与诗歌相对的文体，包括小说和非小说。从内容或题材上说，他们又常被称作社会批评家、道德家、预言家、圣哲等。本书称他们为“文人”(man of letters)，一是强调他们的词语焦虑，二是突出他们的道德思考。